

# 守住社区，做生活化的革命

## 与张和清教授的一席话

※ 郑依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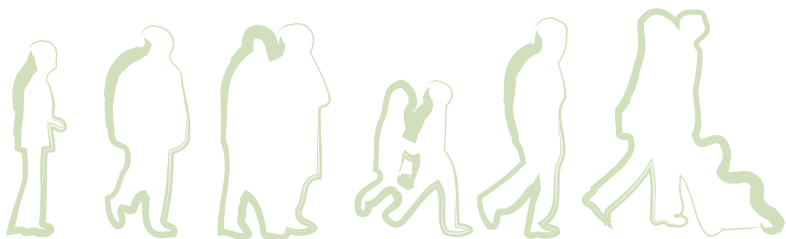
作者郑依依访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张和清，并整理其在“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上发言。郑依依为民间组织工作者。

从云南平寨的村子出来，这中年妇女在广州工作，也有三、四年了吧？目前，是化妆品用具厂里的女工。

她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哭得好不凄凉——腹痛已经好一段日子了，因为担心医疗费而一直硬撑著，实在熬不住了才过来求诊，怎料刚才检查映出子宫里一团黑影——是肿瘤？是癌症？要做手术吗？没有医疗保险，怎掏得出医药费？

她满脑子疑问和惊恐，可是，她只会说方言，听不懂操普通话和粤语的医生和护士喋喋不休的话。

又急又惧，胸口发闷，但她不敢细想——她工作的生产线制造著名化妆品牌的粉扑，每天在粉尘飞扬的车间15小时，胸口堵得要命。有人说，她肯定是患了尘肺病。



## 2001：绿耕初进云南农村

在中山大学草坪旁边的咖啡座上，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的张和清老师告诉我如上的故事。张老师是绿耕的创始人之一，绿耕是在大陆参与推动社区支持农业(CSA)的一个非政府组织。

自从2001年进入偏远的云南平寨，绿耕搜集村史、民俗，为妇女开扫盲夜校，兴建社区活动中心、组织妇女刺绣公平贸易的产品……等等，尝试重整村民对民族的认同，透过能力建设，带动这小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平寨，一如上千上万的中国农村，小农的经济模式，有限的可耕地，农产品利润远追不上生产成本；而距今不过12年前，当绿耕初次进村的时候，更是交通与通讯都与世隔绝——却为平寨保留了一份被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清洗前的简朴。

张和清珍之重之的，是中国小农以土地为生活之本的生产生活方式。

“而现在中国的大多数，就是八亿人口在农村，那种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仍然保留著，不管是土改将土地给小农，集体化收上去，后来包产到户后又给了小农，还是以家户为单位，进行农业生计，家户没有解体。土地是生计的来源，不是用来赚钱，是用来养家糊口。农民依然维持农村的生活方式，不是城市的生活方式，比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跟土地、自然的关系并没有断裂。”

她不是没有后悔，为什么从云南老家千里迢迢跑来城市。以往和丈夫男耕女织，快快活活地一天一天的过，从不觉得所谓生活逼人。可自从出来打工后，每天都想著老家的一片土地。她也向一起来到广州的老公哀求过一同回家，但丈夫抱怨：“当初还不是你说要出来的？现在地都荒芜了，怎么回去？”

对，当初是她说要出来赚钱，给孩子上学。以往，她的一家几口自己种地自己吃，钱不多可都够用，从没想到现金是这么重要。如今，孩子的教育变成了让她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了。

她多么羡慕同村出来的几个小伙子呢——他们比她晚一点来到广东打工，几年后发觉他们这些农民工在城市只是被当成廉价劳动力，没有一点尊严，于是几人聚在一起，写了一份计划书，向社会工作机构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sup>①</sup>申请启动基金返乡创业。

这样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并不能推动国家经济如火箭般猛力高速发展。可正因如此，张和清认为这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之下，中国小农的可贵之处。

## 农民：有土地就有尊严

“小农的可贵在于，他们用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可以有尊严的活著。我是一个主人，我有尊严的活著。虽然这土地是承包的，但我还是个主人，是自由的人，自耕农，有自主性。我种什么，如何种，种多种少，什么时候种，都是自己说了算，不用依附于谁，有土地就有尊严，土地是尊严之所在。”小农是土地的主人，不是农场的工人，不出卖劳动力，而是掌握生产材料的主体，很有主体性。

此外，在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无止境地掠夺、耗用地球资源同时，小农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反而是保育生态、恢复生态，让人在其中能回复并得益于自然的生存方式。“这些小农的生活方式是非常可持续的，恰恰是我们现在所需要所倡导去恢复过来的。它是非常强调永续的，人跟自然的关系，所以他不是大工业、大机器、大农场无限地滥用自然，而是有限度地运用自然，尊重自然的规律。小农跟万物的关系都很和谐，强调六畜兴旺。他的价值是非常大的，很生态的。”

然而，经过这些年，这种简朴正被侵蚀。当电视、手机等通讯网络铺进像平寨这样的农村，当农村人民被农业政策左右、当农村的自然生态因城镇化发展而遭破坏，小农如此简单的生计模式，也被攫夺。原本可以依靠土地的生产供养一家，现在却变得清贫如洗。

## 大陆小农正经历三种“致贫之路”

张和清在“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上，提出中国小农正在经历的三种“致贫之路”。

“我们中国叫收入低导致生产性的贫困；生产已经变成全球化生产的一部分（市场化农业），小农在改种一种适应全球化需求的那个所谓的农作物的时候，他完全不自知。但是当那个价格突然暴跌的时候，许多小农血本无归，甚至喝农药事件不断发生。这就是全球化的‘生产性致贫’。”

“第二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发生在中国，就是钱不够花的‘消费致贫’。消费拉动内需，这是中国的一张王牌。我们在农村看到许多村民卖猪买手机，卖鸡充值（手机）话费。我们在（四川）映秀的时候，妇女做刺绣做了一年多，好不容易手上拿了一些钱，然后来一个家电下乡的政策<sup>②</sup>，然后这些妇女就买两、三台电视放在板房里。她说政府说的，我们以后要住别墅，三层，一层一个电视。结果，刚刚买了没过几个月，板房拆掉等待永久性住房，在不断搬家的过程中许多家电要么被偷掉，要么搬不走丢掉。这个叫输入性的贫困。还有教育、学费等消费的需求使小农苦不堪言。”

“第三个是‘寅吃卯粮’的‘生态性致贫’，就是天灾人祸的恶性循环，导致底层民众生活的脆弱性不断加剧。许多发展计划不计后果，或者非常短视，以牺牲后代的资源带来暂时繁荣，但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GDP增长，会导致天灾——人祸恶性循环。比如高铁沿线，地震后发生大规模泥石流滑坡灾害，等等。”

“导致小农种种致贫之路，当然是资本主义成了全球霸权，垄断发展观念，蒙蔽其它各种可能——甚至身处其中的农民或城市人，仿佛也觉得没有其它出路。”

张和清认为，中国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本来就在抗衡资本主义的意识型态；可是一个不留神，本来过著纯朴农村生活的小农，也会跌进被广告等宣传机器所建构出来的虚幻图像之中：现代化、方便的城市与落后、闭锁的农村二元对立，对前者趋之若鹜，对后者避之则吉。

正如元首的故事里，那平寨妇女当初游说丈夫一起到广州打工，正是当全国经济越发进入深度的市场化、现金在农场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放弃了农村以土地为本的生活与生计，选择了进入城市谋生。当青壮的村民都走向城市当农民工，农村因流失劳动力而变得更为凋敝，成了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守的所谓“386199部队”<sup>③</sup>。

“人的主体性就在于人有一种本能，去寻找所谓的幸福，自己想要的生活，人是圆梦的动物嘛。但资本主义把我们的可能性都消灭掉，变成它的一个螺丝钉或工具。”张和清说。可是，当看不到意识型态操控下的社会结构和发展，人们对于何谓幸福生活是不自知的。

## 城市文化排斥小农 小农被他者化和妖魔化

“这涉及深一层的讨论，就是什么是幸福生活。农民是通过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去向往城市的：便捷、快速、光鲜亮丽，抱著这样所谓的梦想，而去否定自己已有的原来的谋生价值。但是当他真正来到城市，一般都是梦想破灭，光鲜亮丽背后有很多很多心酸的故事。”

反之，在判断分明的二元对比之下，城市人眼中的小农，也成了短视、愚昧的代名词。张和清对此非常生气。“这些都是城市文化对小农的建构，是他者化和妖魔化。第一是城市人并没有很好地去了解小农，甚至都没有走进村庄，根本不知道小农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什么，是通过所谓主流的媒体、通过意识型态等等，被偏见包围，排斥小农。我觉得这种话语体系是很恐怖，恰恰是因为建构了这种城市中心主义的现代化、价值观，把小农妖魔化为没有文化。这有几种危害：优化了这套城市的生活逻辑，过份的美化了都市化、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合理化了你比别人高一等的价值；同时，否定农村和小农的存在价值。”

但，虽然小农不论是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或是承受著文化意识上的种种污名对待，张和清却并不悲观——也许，他的希望，正是由于一份从事著社会运动之中的人所抱的信念与坚持。

“我们这些年来，致力扎根于农村，慢慢去恢复它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看到进展还是蛮大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民愿意去恢复种植、养殖，有些40岁以上、中年的村民，本来就是不离土的，就守住农村。城市人也有厌倦城市生活，他们也愿意加入到农村去。”

## 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 小农绝不会消失

虽然贬抑农村的主流话语是最大的危害与威胁，发展逻辑中以城镇化、消费主义，带来GDP更大的增长，就像推土机一样，不断向农村拓展，令人揪心；但是，张和清指出，“你一方面看到他很危机的一面，可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尽管我们的政策看起来很不理想，但如果深入到千家万户，小农完整保留的地方，人民群众的力量，你会看到很有希望。”

张和清确实有信心，甚至能鼓舞到说出“中国小农绝对不可能消失”这样的壮语。他条理分明的阐释著。

首先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多元化。“要把这片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农民消灭掉，是没可能的。中国的多样性是没办法消除的。例如云南，有不同的地域、民族、地貌、文化，它的差异性极大的，哪怕是广东这样发达的地方，珠三角跟粤西、粤北、清远的少数民族，完全是两个世界来的。这些多元化的生活生态，不可能用一个价值去消除掉。”张和清最近去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越来越多牧民自言祖祖辈辈就是游牧民族，离不开草原，不可能住在单元楼房；“像四川地震以后‘被上楼’的农民，现在也为生计而不断抗争，因为他们祖祖辈辈就是小农的生活习惯。”

其次是他认为小农的存在是中国最根本的价值，占了八亿的绝大多数人口依然是要依靠小农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来维持生计，此巨大的数字不可能一下子清零。“中国绝对不可能所有人都去吃商品粮的，不可能都变成居民去吃工资饭的。”

## 愈来愈多人反思城市价值

可是更重要的，可能是眼见渐渐越来越有人在反思城市价值，令张和清切实地感到希望。这或者就是社会运动中人，每一步踏出时的力量之根本。“人民对所谓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一种反朴归真的梦想。原来就有小农保留这种生活方式，他们已经习惯；另外也有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一方面对钱的依赖很大，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反弹，已经有很多人返乡。”就像文首的平寨青年回乡创业，绿耕参与社区伙伴在大陆城市推行的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很多是有知识的青年愿意回到乡下，甚至是，农村的简朴生活，也吸引了城市的精英。“我们招聘工作人员驻村的时候，没想到一对深圳的夫妇，老公是法官，老婆是做外贸的，他们想把房子卖掉，把工作辞掉，愿意到农村去重新过另类的的生活，活出自己。”这无疑是对推动生活文化反思的努力的鼓舞。

可是，绿耕还是清楚，已经破败多年的农村，要经过重整，才能凝聚住村民，以至建设成为理想实现之地：“乡村要再造，不再造怎会有吸引力？把村民组织起来，通过生态种植，生计有改善，但最重要的是要跟他们一起，将一些公共空间改造出来。”在平寨，绿耕兴建社区中心，修建公共广场；在广东乡村恢复大祠堂，经营乡村旅舍，坚持著一个使命，让农民的生计变得稳定而可持续，创造另类的、城乡联动的，没有中间商剥削的公平贸易。也是从自身开始，推广小农生活的价值与意义。

“拿健康食品来说，我们要自己先吃健康食品，那我们的精神状态就很好呀，然后带动周围的人来吃。我们早期不用化肥农药来种的米，但自己是不吃的，用好的价格卖给有钱人。后来我们很快就反思，我们不是搞特供，我们自己要吃，村民要吃，这就有用了，身体慢慢好起来，带动更多人吃不用化肥农药、老品种的大米。越多人吃这些农产品，那许多污染环境的化肥公司、农药公司就倒了嘛。”张和清笑说。

## 改造农村 打造公共空间

而且在改造农村之时，有其政治上充权的意义。“我们把公共空间打造出来，大家可以去参与，实现民主，发声，妇女充权，实现这些政治目标对乡村善治非常重要。还要去推动文化遗产，他认不认同，要通过教育去做。我们要去做意识提升、充权等工作，让他们去重新找到自己，真正认同作为小农的价值。”

绿耕开始时在平寨守了五、六年，守不住，因为城市化、工业化甚至全球化不断把农村的内容掏空。隔绝农村与城市，想单纯地依靠农民的力量推动可持续发展是不够的，因为农村的绝大多数问题是城市化、工业化造成的。因此必须推动城乡联动，恢复城乡共生的互惠关系。

2007年起，绿耕开始了城乡合作的项目，推动城市社区居民支持农村发展。例如在平寨成立“红米种植”、“土鸡养殖”、“刺绣”等三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向城市居民提供老品种大米、土鸡、土鸡蛋、民族绣品等农作物与手工艺。绿耕亦开始组织城市消费者，例如与具体的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合作，在屋苑社区以食品安全等相关主题的讲座向居民推介生态农副产品，亦借助网路或电台等传媒向社区居民宣传农耕体验活动，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进入村寨体验生活，实地考察农作物生产状况。

其后，绿耕将云南、四川及广东项目的不同村庄，与昆明、成都、广州等城市社区对接起来，逐步形成复杂的公平贸易网路，一个农村提供的农副产品可供应多个城市社区；而同时，一个城市社区又销售来自多个农村的产品，城乡之间的社区支援网络互补互惠。绿耕并在广州等城市，尝试开设农副产品专卖店，以社会企业<sup>④</sup>模式经营的店铺为社区基础，直接销售农村社区的生态产品，通过点点滴滴日常生活化的意识转化，逐渐建立“农村——城市社区支援网路”，甚至扩大城市网络，与城市另类生活团体如素食团体、志同道合的社会团体如环保组织等结成合作伙伴，定期在城市社区举办“有机小市集”，一起摆摊、一起推广环保、健康、惠农的理念。


“消费者除了吃，还有责任，我们希望他慢慢变成会员，建立起消费者合作社。我想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过以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sup>⑤</sup>坚实的网路为标杆，张和清谦逊地反省：“我们承认城市消费者这一块，我们没有力量，最重要是我们没有人力、资源和经验。”

城乡联动的主体，主要是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我们从一个村走出去，把城市跟村连接起来，很多奇迹就会发生。米不断有人买，就有机会跟小农谈合作的重要性，谈不用化肥农药，谈村怎么发展，村子怎么规划，妇女怎么参政，跟养殖合作社的妇女谈村子要不要修路，谁来修？选举一个小组，大家一起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这就是乡村公共治理。”

“缘耕先在村里找出最贫穷及最被忽略的人，让社工住在村子里，陪伴他们成长，相伴同行，一起思考，一起对话，慢慢改变。大陆的每一个村，每一个社区都是两极分化的，村里的穷苦人被大户看不起，甚至被大户剥削。秉持弱势优先的工作原则，我们通过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或访灾问难，先把最‘弱势’的人群拣选出来，然后通过个案、家庭、小组工作等，把这些底层民

慢组织起来，从互助组变成合作社后，目标是通向自助与互助的能力建设。当一个乡村出现另一支民众力量的时候，乡村的权力关系就在改变。我们广东乡村的妇女刚开始连话都不敢说，现在面对民政部的司长的时候，都会介绍乡村旅舍。社会工作就是相信，每个人都能改变。”

“守住社区，做社区和社区支持网络，一个社区改变了，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大陆的社会就是这样，能够通过社区推动社会变革。从底层长出来的，自下而上的生活化的社会运动，就是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做起，在社区开花结果。”张和清说。

- 
- ①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介见附录一。
  - ② 因全球金融海啸导致消费性电子产品外销需求急速衰退，中国政府于2008年底宣布家电下乡，以扩大内需。按照规定，全大陆非城镇户口居民购买彩色电视、冰箱、行动电话与洗衣机等四类产品，补贴产品售价的13%，最高补贴上限为电视2,000元人民币。
  - ③ 随著中国城市化快速的发展，农村男性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工的数量剧增，留守农村的妇女、儿童、老人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特殊群体，被戏称为“386199部队”（38妇女节，61儿童节，99重阳节）。
  - ④ 参考见附录二：“社会企业”。
  - ⑤ 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简介见附录一。